【古代文学研究】

"中国古典文学资源的当代益用"笔谈(四篇)

编者按: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如何充分利用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资源,在全球化语境中,勇于开拓而不失去自己精神的家园,成为一个知古知今、知中知外的学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古典文学研究与国际汉学研究,而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共同课题。有感于此,本刊邀集活跃于相关领域的当代学人,以"中国古典文学资源的当代益用"为题发表笔谈。本期推出的一组文章中,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先生的《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意在结合自己的《道与逻各斯》一书,就当前国际汉学与西方理论成果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提出自己的看法,其重点在于如何正确运用中国与西方阐释学理论与方法。苏州大学教授方汉文先生将视域集中于当前讨论的焦点之一,即如何建立中国文学史新模式的目标上。南开大学教授宁稼雨先生则就当今古代文学研究中跨文化的主题学提出自己的看法。主题学方法近年来在中国古典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均相当流行,如何看待其得失,并使其本土化,如何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文化学,是本文所提出的重要问题。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从广义的国学研究角度进行的反思,会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本组文章与一般流行的笔谈不同之处在于:作者以各自的实际研究成果来展示自己的观念,并不停留于空泛地谈论应当如何,或是就某一个观点展开激烈争论。这未必不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界相当重要的一种理论话语模式。归根结底,并不在于提倡"问题"还是"主义",而是研究的实绩能说明一切。当然,我们仍继续推出多种形式、多种看法的文章,其中也可能包括有争议的观点,目的在于促进古典文学研究的跨学科与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1—0208—11

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张 隆 溪
(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香港)

中国古典文学有自己的批评传统,而在我们今天所处的学术环境里,如何坚持自己的传统,又融汇国际汉学和发源于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拓新的领域,使用新的方法,以期取得新的成果,的确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很可能会遇到两种偏向:一种过分强调文学和文化的独特性,认为东西方传统在根本取向上南辕北辙,互不相干,所以也就各自独特无"比"。这往往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固步自封的弊病,目光和心胸都很狭窄,最终必然造成思想的枯竭,在学术研究中无法形成活泼发展的局面。另一种则生搬硬套,把西方流行的时髦理论机械套用来论述中国文学,却往往对中国传统缺乏了解,看来洋洋洒洒,实则无的放矢。这往往是学了一点外文、但对中国传统却知之甚少者易见的弊病。他们本来很西化,但仅仅在西方当代理论中看见一鳞半爪,尤其是曲解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就一下子变成国学护卫者,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来论述中国传统。其中更有甚者则食洋不化,把自己都没有弄懂的外国概念和术语,拿来硬塞在半通不通的语言里,写出的论文像拙劣翻译的文字,以晦涩假冒深刻,欺世盗名。这样的论文看起来似乎热闹,实则制造学术泡沫,没有真正的价值。这两种偏向都不可取,所以我认为,我们的确应该了解国外汉学的情形,也应该了解当代西方的文学理论,但与此同时,又必须避免机械搬用西方理论,更不要赶时髦,借外国的理论概念和术语来标新立异。总而言之,完全排斥外国的理论固然不可取,但以为外国的理论一切高明,不经过自己头脑的批判思考即人云亦云,则更不可取。

那么,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如何融汇西方理论而又避免机械套用西方理论呢?在此,我希望用自己的经验做一个具体例子,来讨论这一问题。用自己的研究为例,也许难

免自我标榜之讥,可是我把思路和研究方法呈现在诸位方家之前,也是剖析自己并求教于学界诸位高人的坦诚之举。如果由此得到学者专家们的批评,引起大家的讨论,那更是我所庆幸的了。

我曾在美国长期任教,深感在当代西方的学术界,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的认识,仍然有不少问题。这个问题和赛义德《东方主义》一书中所描述的问题基本一致,即西方学界所见的东方,往往并不符合东方的实际,而是西方所想象的东方,是作为西方的“他者”即与西方相反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一个幻象。这当然不是西方所有汉学家和理论家的情形,但不可否认的是,把东西方文化对立起来,过分强调文化差异,确实是西方学界的一个问题。钱钟书先生《管锥编》开篇即以黑格尔为例,批评他“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其实这样的错误,在当代西方学界依然存在。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就较多批评这种错误,通过具体例证来讨论中西文学和文化的汇通之处。拙著《道与逻各斯》就是循着这一思路写成的。此书英文初版于1992年,1998年又有冯川先生翻译的中文版。我想趁此机会说明写作此书的基本设想,也把近年来阐释学的发展略做一些检讨和评论。

此书英文原版在《道与逻各斯》这个主标题下,还有一个副标题是“东西方的文学阐释学”,说明该书以文学阐释为主,但其理论基础是阐释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讨论的阐释学,是在哲学的基础上来探讨语言文字的阐释问题。该书的写法是先讨论阐释学,然后进入东西方文学的阐释。就理论的应用而言,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选择阐释学来做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切入点呢?这样做是否会把一个源自德国传统的理论,套用在中国文学的讨论之中呢?然而我的做法不是应用现成的德国理论、概念和术语,而是把这一理论还原到它产生的基本问题和背景里。我认为,东西方的比较必须从基本问题入手,而不能机械搬用西方现成的理论将其强加在东方的文本之上。当然,阐释学也是西方理论,但这一理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方法,不可能按部就班地套用这种方法来解决理解和解释的问题。阐释学的基础是有关语言和理解的问题,而那是任何文化、任何文学传统都存在的问题。在西方,一方面有解释古希腊罗马典籍的评注传统,另一方面有解释《圣经》的评注传统,另外还有解释法律的法学传统。19世纪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正是在这些局部阐释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有普遍意义的阐释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也历来有解释儒家经典、佛经和道藏典籍的评注传统,有对诸子的评注,有历代的文论、诗话、词话等。在东西方丰富的评注传统中,关于语言、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有许多可以互相参证、互相启发之处,所以在阐释学方面,也就有许多可以探讨的共同问题。东西方表述这类问题可能各不相同,但问题的实质却是基本相同的。所以,在这一层次上做比较,讨论语言和理解,就不会把西方理论和解决办法机械套用到东方的文本上去。

那么,此书要讨论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呢?首先就是东西方文化传统如何看待语言和达意的问题。该书题为《道与逻各斯》,就因为中国之“道”,希腊之“逻各斯”,都恰好涉及语言和达意的问题,而且各在一个字里,表述了相当类似的看法。这看法就是思维和语言表达有距离,内在思维(道理之道)不可能充分用语言(道白之道)来表现,但思维和语言都包含在同一个“道”字里。《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思是能说出口来的道,能叫出名来的名,就已经不是真正的道,真正的名,所以他又说“道常无名”。换言之,最高的道,宗教哲学的真理,都是超乎语言之上,说不出口来的。所以庄子说:“辩不若默,道不可闻。”同样的意思,也表现在“逻各斯(logos)”这个希腊字里。逻各斯的基本含义是说话,所以独白是monologue,对话是dialogue,其中mono表示“单一”,dia表示“交叉”或“互相”,后面加上logue,也就是逻各斯。同时逻各斯又表示说话的内容、语言讲出来的道理,所以很多表示学科和学术领域的词,都往往用-logy即逻各斯来结尾,例如anthropology(人类学),biology(生物学),theology(神学)等,而专讲如何推理的logic即“逻辑学”,更直接来自logos即逻各斯。由此可见,道与逻各斯都和语言、思维相关,这两个字各在中国和希腊这两种古老的语言文化传统里,成为非常重要的观念。

如果说,道与逻各斯既是内在思维,又是表达思维的语言,那么东西方在讨论思维和语言表达的关系时,都往往认为语言不能充分达意。哲学家多责备语言不够精确,宗教家声称与神或上帝相通的神秘经验无法形之于言,作家和诗人则感叹内心最深邃的思想感情都不可言传。德里达认为西方传统中有贬低书写文字的倾向,以内在思维为最高,口头语言不足以表达内在思维,而书写文字离内在思维就更远。这种分等级层次来贬低书写文字的倾向,就是他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德里达认为,西方的拼音文字在书写形式上力求接近口头说出的语音,就反映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等级次序,因此逻各斯中心主义也是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他又依据美国人费诺洛萨和庞德对中文并不准确的理解,推论非拼音的中文与西方文字完全不同,并由此证明逻各斯中心主义只是西方所独有,而中国文明则是完全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发展出来的传统。可是从老子和庄子对语言局限的看法,从《易·系辞》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等等说法,我们都可以认识到,对语言局限的认识是东西方共有的看法。东西方文化当然有许多程度不同的差异,但把这些差异说成是非此即彼的绝对不同,甚至完全对立,则是言过其实,无助于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

然而,对语言局限的责难、对语言不能充分达意的抱怨,本身却又正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所以凡责备语言不能达意者,又不得不使用语言,而且越是说语言无用者,使用语言往往越多越巧,这就是我所谓“反讽的模式”。庄子虽然说“辩不若默”,主张“得意忘言”,但他却极善于使用语言,其

文章汪洋恣肆, 各种寓言和比喻层出不穷, 变幻万端, 在先秦诸子中, 无疑最具文学性、最风趣优美而又充满哲理和意境。中国历代的文人墨客, 也几乎无一不受其影响。惠施曾质问庄子, 意思是说, 你常说语言无用, 但你却使用语言, 你的语言不是也无用吗？庄子回答说:“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他还说:“言无言, 终身言, 未尝言; 终身不言, 未尝不言。”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 就是说首先要知道语言无用, 知道语言和实在或意义不完全是一回事, 然后才可以使用语言。有了这样的意识, 知道语言不过是借用来表达意义的比喻性质的临时性手段, 那么你尽可以使用语言, 而不会死在语言下。但如果没有这种意识, 哪怕你一辈子没有说多少话, 却未尝不会说得太多。然而这绝不是庄子巧舌如簧, 强词夺理的狡辩, 因为这其实说出了克服语言局限的方法。这就是认识到而且充分利用了语言的另一面, 即语言的含蓄性和暗示性, 使语言能在读者的想象和意识中引起心中意象, 构成一个自足而丰富的世界。

这样一来, “辩不若默”就不纯粹是否定语言, 而是指点出一种方法, 即用含蓄的语言来暗示和间接表现无法完全直说的内容。这在中国诗和中国画的传统中, 都恰好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且普遍使用的方法。既然语言不能充分达意, 那么达意的办法就不是烦言聒噪、说很多话, 而是要言不烦, 用极精炼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意蕴。中国诗文形式都很精简, 讲究炼字, 强调意在言外, 言尽而意无穷, 这就成为中国诗学的特点。苏东坡在《送参寥师》中说:“欲令诗语妙, 无厌空且静; 静故了群动, 空故纳万境。”这句话可以说道出了我国古典诗学的一个要诀。东坡欣赏陶渊明, 说其诗“外枯而中膏, 似淡而实美”, 也表现了这一诗学审美判断的标准。不过, 我们不要以为只有中国或东方诗学有此认识, 因为这种讲究语言精简的文体, 也正是《圣经》尤其是《旧约》的特点。所以从比较诗学更开阔的眼光看来, 对语言唤起读者想象的能力, 东西方都有充分认识, 而且这种意识也体现在诗人的创作当中。所以我在书中不仅讨论了陶渊明和中国诗文传统, 也讨论了莎士比亚、T. S. 艾略特、里尔克、马拉美等西方诗人的创作, 更随处涉及西方文学批评理论。这种讨论一方面在诗人自身的文化环境中来理解其作品, 同时又突出一些共同的主题, 如语言和表达的问题。把不同的作品并列起来看, 尤其联系到共同的主题, 就可以见出文学阐释学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 并且见出其在不同文学和文化传统中的呈现。这样, 我们就可以通过对基本问题的深入讨论, 在东西方比较中加深我们对语言和表达问题的理解, 也加深我们对意义和解释问题的理解, 同时也学会欣赏作家、诗人如何克服语言障碍而成功实现圆满表达的艺术方法。

阐释学充分承认我们认识主体的作用, 承认同一文本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中国早有“见仁见智”和“诗无达诂”的说法, 这对我们说来并不难理解。但是, 这并不等于理解和解释漫无准的, 批评判断没有深浅高低之分。近年来对理解和阐释标准的讨论, 可以说是阐释学发展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杰拉德·布朗斯 (Gerald Bruns) 讨论阐释学发展, 就特别注意阐释经典与阐释者所处时代环境的关系。阐释总是有具体环境和内容的, 并不是主观随意的纯意识活动。意大利学者和作家艾柯 (Umberto Eco) 提出了“解释”和“过度解释”的概念, 认为作品本身有其意图 (intentio operis), 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约束或指引读者的理解。合理的解释, 应该尽量能圆满解释文本中的各个细节, 使之相互支持而不彼此龃龉, 所以我们不能忽略文本而作过度的诠释。在此问题的讨论中,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贡献。正如伽达默尔所强调的, 阐释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 而首先是存在的基本状态。也就是说, 理解和解释问题无所不在, 随时需要在具体境况中去解决。这一方面说明, 阐释学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 并非一旦掌握就可以到处搬用, 另一方面也说明, 这是我们需要不断深入思考的问题, 尤其在东西方比较中, 可以不断继续去探讨。特别在古典文学阐释学领域, 我们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 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东西方古典文学比较研究是一个范围广阔、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 但也是一个对研究者要求甚高、并非轻易可以取得成就的领域。我们必须对东西方的历史、哲学、文学和文化传统有相当了解, 才有可能做出一点成绩。在这个研究领域里, 拙著《道与逻各斯》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我相信,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 深入而不是浮泛的中西比较应该能做出一点贡献, 也应该有创新发展的可能和前途。

作者简介: 张隆溪, 男,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文学史的开篇之作与当代创新模式

方 汉 文

(苏州大学中文系, 江苏 苏州 215021)

一、“第一部中国文学史”

文学史的模式与文学观是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它关系到当代中国学者如何撰写古代与现代的文学史。更为突出的是, 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具有跨文化意义。海内外学者同时在撰写中国文学史, 如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等人的中国文学史, 就受到当代许多国内学者的激赏, 并奉为楷模。无论如何看待海外学者的文学史, 无可讳言的是, 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业已步入一个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对话时代, 多元模式